《反戰聲明》網路媒體投書之對話初探

李佩雯*

摘要

本研究以《反戰聲明》事件為主軸，試圖回答下列問題：聲明發佈後，網路投書作為一種線上溝通形式，展現出哪些溝通目的與策略？其中是否可見西方對話理論所強調的重要內涵？本研究透過文本分析後發現，投書者所展現的溝通目的可見以下四種類型：（1）糾錯貶抑型、（2）提問對話型、（3）重新框架型、（4）自我辯駁型。其中僅有少數投書反映出部分西方對話理論的關鍵主張。

關鍵詞：反戰聲明、言論自由、對話理論、線上對話、異議溝通

*李佩雯為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與口語傳播暨社群媒體學系合聘教授。
聯絡方式：pwlee@mail.shu.edu.tw

對話不僅僅意味著簡單的訊息來回交換，它指向參與者「相遇」(meet) 的特定過程和溝通質量，以及允許「改變與被改變」(changing and being changed) 的發生。在對話中，我們並不知道自己到底要說什麼，我們不但可能讓對方驚訝，也可能讓我們自己驚訝 (研究者翻譯) (Cissna & Anderson, 1994, p.10)。

壹、前言

2023 年 3 月 20 日由傅大為、盧倩儀、馮建三、郭力昕四位學者組成的「臺灣反戰聲明工作小組」召開記者會，發表了一份《反戰聲明》(見 <https://www.eventsinfocus.org/sites/default/files/2023-03/%E5%8F%8D%E6%88%B0%E8%81%B2%E6%98%8E%E6%9A%A8%E9%80%A3%E7%BD%B2%E5%90%8D%E5%96%AE0320.pdf>)。聲明涵蓋四大訴求，包括烏克蘭和平：要停戰談判，不要衝突升溫；停止美國軍事主義與經濟制裁；不要美中戰爭，臺灣要自主並與大國維持友好等距關係；國家預算用在民生社福與氣候減緩而非投入戰爭軍武。該份聲明推出之後，引發各界論辯。截至 2023 年四月底為止，大約有五十位學者賢達連署該聲明。

《反戰聲明》內文具體指明，希望能激起各界討論與對話。在記者會之後，網路媒體上針對該聲明的各種投書屢屢可見。這些網路投書，包含反戰學者的回覆，許多表明以對話為目的開展論述。雖然國外研究指出網路空間上的對話效果，往往因為缺乏上下文脈絡而不盡理想 (Filatova^a & Volkovskii^a, 2021; Witschge, 2008)，但民眾倚重網路來交流公共議題，確實是當前的趨勢。譬如，近期的研究發現，國內大學生不斷嘗試在 Dcard 上發表長篇的公共議題討論，使用者針對來自各方的長篇論述進行留言互動，做到一種「自我公民」的新型公共討論參與樣態 (曹家榮, 2023)。

理論上，每位網民皆可能以電子書寫的溝通方式，運用語藝介入 (rhetoric intervention) 公共事務 (沈錦惠, 2007)。但多數人卻在並不全然察覺自身的溝通目的下 (究竟是對話？還是發洩情緒？)，持續在各種網路

平台上進行自身所以為的對話論述，使得不少線上議題討論，發展到後來不但難以聚焦，反而加深對立。

本研究查詢國內涉及「對話」(dialogue)的研究，發現不少植基於西方宗教、哲學、教育類文獻，譬如巴赫汀的對話主義哲學及蘇格拉底的對話式教學。對話乃重要的傳播與溝通行動，但國內卻鮮少研究從溝通實踐的角度，借重口語傳播領域中的對話理論(dialogue theory)，進一步探查線上公共議題討論的具體樣貌。對話理論於 21 世紀前後受西方學界廣泛討論，固然當時學者們思考的是面對面的溝通型態，但其理論核心所強調的：與對方產生連結、願意審慎傾聽與考量對方的想法、與差異共存，甚至引發改變等(見本文第二節)，皆可被視為網路或非網路世代人們彼此互動所欲達成的重要目標，不該因溝通管道(channel)的變革而被忽視。

據此，本研究計畫以實際案例的分析與探討，冀望能促進國人更深度地認知與思索「何謂以對話為目的的溝通」，以利日後在網路渠道上進行更趨近於對話理論精神的溝通行動。故，本研究以《反戰聲明》事件為觀察主軸，嘗試探問：《反戰聲明》發佈之後，網路投書作為一種線上溝通形式，展現出怎樣的對話樣貌？

貳、文獻探討

對話已被研究了幾千年，最遠可追溯至古希臘羅馬修辭學家崛起的時代(Barth & Krabbe, 1982; Zappen, 2004)。根據 Anderson, Baxter, & Cissna (2004) 的文獻爬梳，1970 年代之前，西方學者側重的是柏拉圖所探究的蘇格拉底式對話，強調人類經驗與倫理的本質。此時期的討論雖重要，但僅侷限在視對話為一種語藝的探詢(a model for rhetorical inquiry)，或是一種教學方式(蘇格拉底對話教學法)。70 年代後，為回應人類心理學運動，學術界重新聚焦對話概念。不過要一直到 20 世紀後期，對話作為一種獨立的研究興趣，才開始廣泛地出現在人際溝通與跨文化溝通相關的學術著作中。而這波受跨學科討論的潮流被西方學術界稱之為「社會對話的轉向」(Lane & Bartlett, 2016)。

一、對話的諸家觀點

從溝通研究與訓練的角度出發，Pearce & Pearce (2004) 將對話做了以下兩種面向的定位：

(一) 對話作為名詞 (工具與容器說)：第一種傳統面向，將對話視為名詞，用來指稱一種不同於其他溝通的類型。就像一種交談的「容器」(container)，溝通參與者可以在此安全的容器中進行對話。這種類似交流訓練的參與者將對話描述為以「共同思考」(thinking together) 為目的，沒有議程或其他特定目的。這個容器內的對話形式分為三個部分：第一，發言者通過重述或表達感謝來確認前面的陳述；第二，進行諸如「這讓我想到」(this brought me to think about) 之類的說法，然後再陳述自己的思考；第三，盡量避免聚焦某個人論述，而不小心展開「直接的人際互動」。在容器說的原則中必須避免直接提問，因為它有可能脫離對話的「安全容器」並陷入不可控的人際動態互動中。這套傳統做法通常發生在美國的商業界，讓不同的團體有效地在同一個場合針對敏感的議題 (例如：種族衝突)，以一種「暫停習慣性思維和行動」的方式進行互動。

(二) 對話作為形容詞 (風格說)：第二種傳統面向，實踐者以「對話式溝通」(dialogic communication or communication dialogically) 來指稱可以在任何溝通形式中進行的活動。在進行對話時，人們願意傾聽、直接提問、提出自己的想法等等。這些言語行為都是以持有自身立場的方式進行，但同時允許其他人也擁有空間能握持自己的立場，並且在不需要反對或被同化的情況下，開放地傾聽他人的立場。參與對話式溝通者的語言行動，通常是通過語言和非語言後設溝通 (metacommunication)、主持人的協助，或特定公眾場合的精心設計來實現，面對的都是持有某些政治或社會堅定立場的人。

據上述定位，本研究的初衷為探討當代網路對話的實踐，遂著重於探究「對話風格說」。19 世紀末傳播學者在人際、組織、跨文化、修辭、媒體、社區和表演場域中，尋找和創造有關西方對話理論之應用 (Anderson, Baxter, & Cissna, 2004; Anderson & Cissna, 2008; Anderson, Cissna, & Arnett, 1994; Cissna, 2000)。多數關於對話的溝通研究都受到著名理論家的觀點所啟發

(例如：Martin Buber, Hans-Georg Gadamer, Jürgen Habermas, and David Bohm)。對話是一個具有爭議的概念，學者們對此看法與定義不一：

(一) Buber (1958) 強調對話必須秉持著「我—你」的概念 (I-thou)。「我—你」不是兩個詞，而是一個連結在一起的詞彙。對話時，「我」不該脫離其注意力所指向的「對造」(a thou or you) 關係而發展。全方位的「傾聽」(listening) 亦是 Buber 所指對話中的重要元素。Buber 認為對話分為三類 (Asakavičiūtė & Valatka, 2020)：第一，真正的對話 (genuine dialogue)：包含了即時性、相互性、真誠性、平等性與靈魂的親密性。第二，實務型對話 (technical dialogue)：往往出現在迫切需要實現客觀理解，努力實現互利共贏的情境下。Buber 稱這一類的對話為「沒有靈魂的對話」，就像某些商業交流一樣，它建立的是夥伴關係，而不是真正的情誼。第三，獨白 (monologue)：這一類對話的出現只是因為個人想要證明自己，獨白可以被看作是一種「反」對話，不算對話的自說自話。

Foss & Griffin (1995) 提出「邀請式語藝」(an invitational rhetoric) 的概念，與 Buber 所謂「真正的對話」確有共通之處。她們將女性主義的原則納入古典語藝，挑戰傳統語藝追求的陽剛競爭與操控，為的是創造一種基於平等價值，提供觀點、創造並鼓勵其他觀點的語藝形式。根據邀請式語藝的定義，「語藝是欲進行瞭解的一種邀請，並創造了根植在平等 (equality)、內在價值 (immanent value) 及自決的 (self-determination) 關係」(Foss, 2009, p. 570)。因此，說服或改變他人並非邀請式語藝的傳播目的。

(二) Gadamer (1975/2004) 重視的是對話過程中所出現的「新意義」。對他來說，理解是一種透過對話和相互質疑文本 (texts) 的體驗。對話者應保持開放的態度，接受自身文本或主張所受的質疑。由此，對話中的溝通理解所指的應當是產生新的意義，以檢驗新萌生的真理的過程，而非吾人過去所想像的直接接受或複製對方回應的主張。Gadamer 的貢獻是將對話想像成人類以一段「過程」來解讀關係與文化的能力。

(三) 哈伯馬斯 (Habermas, 1987) 強調的是以論述為基礎進行社會對話溝通，以做出理性決策 (dialogic decision making)。他的「理想言說情境」(ideal speech situation) (Habermas, 1992) 指的是參與者根據理性與證據

(reason and evidence) 來評估彼此的主張，在完全沒有任何非理性「脅迫」(coercive) (包括身體和心理脅迫) 的氣氛中提出證據來論理。

(四) Bohm (1996) 認為一般人所謂的對話，其實是固執己見、保有界限的人之間的交流，與 Buber「獨白」的觀點類似。根據他的說法，對話的原文指的是「在我們之間、通過我們以及在我們之間流動的意義 (Bohm, 1996, p.6)」。Bohm 對人類之間的「對話」與「資訊交流」進行了區分：每個人都想要保護自己的基本假設，此舉更像是討論、協商或談判，而不是對話。參與資訊交換與討論的人，並不真正願意換位質疑他們自己的基本假設，也就是雙方根本就在看兩個不同脈絡與系統下的問題，因此也不願意改變或被改變 (Bohm, 1996, p.7)。根據 Bohm 的說法，對話不只是在於討論，更在於出現「變化」(change)，即重新審視參與者的基本主張和看法。這種重新審視不僅攸關立場的基本假設，也同時必須認知到雙方的主張可能是出於兩個不同的脈絡 (Glenn & Kuttner, 2013)。

(五) Wood (2004) 在《對話》(*Dialogue*) 一書的前言中提到，對話研究源於人文主義，批判、後結構與後現代主義傳播的分支，包括許多不同的立場。儘管理論家之間存在差異，但對話的核心思想是：

任何話語或行為總是回應著或預期著其他話語和行為。……真正的對話更多地依賴於他人的回應 (response) 而不是依賴於自我表達和其他溝通面向。……回應——仰賴思想和談話 (thought and talk) 的品質來轉變對自我、他人和他們所居住的世界的理解方式 (研究者翻譯) (Wood, 2004, p. xvi)。

Wood 隨後歸納了對話的幾種預設 (同上引, p. xvi-xviii): (1) 溝通不是線性發生的，它也不只是互動式的。它是起伏、無法預測、多元發聲，相當不確定地。因此對話是自然萌生的，流動的，很大一部分仰賴發生的過程，甚至很難決斷何時終止。(2) 對話意指兩造應當沈浸在彼此互相形塑的過程，而難以預測最終的結果。(3) 對話中的矛盾與張力不斷，矛盾緊張可能來自於雙方的觀點、自我的認同、對於世界運作的不同觀點。(4) 對話不一定是在尋求共通點或共識 (common ground)。尋求共識反而可能阻撓

對話，無法激起真誠的對話，因為決定共通點的幾乎都是強勢的一方（*dominant group*）。對話應該要讓差異能夠「共存」，而不是要消弭那個差異。相反地，傾聽能夠協助我們去找到或創造出一個新的共識基礎（*new ground*），也就是找到新的方法去更開放式地傾聽和理解彼此。（5）對話，必須在過程（*process*）中發生；觀點、關係和自我並非僵化不變。因此，對話應該是一個流動、可被重塑的過程。

綜合上述學者們提出的對話定義，本研究傾向認同 Buber (1958)、Foss & Griffin (1995) 所謂「真正的對話」必須包含真誠、互相、平等性且願意互相傾聽的雙方，尤其重要的是對話雙方（*I-thou*）是彼此相互關聯的一體，而不是清楚劃分我群與他者的敵對狀態。正如同提出《反戰聲明》的幾位學者並非他國人士，而是同為臺灣土地上長期共居同生的國人。

同樣地，邀請式語藝主張對話不僅是為了認同「唯一理念」，溝通與對話的目的在增進彼此聆聽、理解的機會，在雙方的語藝溝通中尋求最大的尊重、諒解與互惠，讓符號發揮最大的創造力與行動力（費翠，2012）。兩造在提出理性論證時，如哈伯馬斯（Habermas, 1987）所言，不受非理性脅迫，透過互相質疑彼此的立場與觀點下，Gadamer (1975/2004) 強調雙方應關注此相互主體的過程中所激盪出的新意義。換言之，對話不只是彼此交流訊息與看法，重點是願意審視雙方的看法，看見不同脈絡與系統（親中？抑或是親美？）下的「反戰」思考，在互相形塑後產出新的火花，甚至改變（Wood, 2004）。

多數人的對話想像，恐怕仍停留在訊息的交換、哈伯馬斯所強調的理性論辯，與堅持己見。因此當人們稱自己與他人在進行對話時，其實更像是以理性論證的形式來進行一場說服與辯論，卻少了願意敞開自我的心理狀態—容許互相連結的彼此，能挪出空間讓自己的主張與立場產生一絲「變化」。依本研究所聚焦的《反戰聲明》與網路回應的脈絡來看，此處的變化，並不同於放棄自身的立場，而是藉由確切聽見雙方的聲音，願意重新審視、調整、新增、刪減原有的主張，進而啟動互相形塑論述的過程。

二、以溝通及語藝視角思索對話

21 世紀初期，口語傳播的溝通研究（*communication studies*）再度審視

對話理論 (Anderson & Cissna, 2008)，且企圖回應以下問題：尚有哪些未被重視的問題或事件，為對話理論提供了其他的視角？以對話作為一種合作現象，是否掩蓋了其他溝通過程中可見的理論新意？性別、種族和權力的衝突如何使我們重新思考對話理論假設？本研究從當時的文獻中，梳理出下列學者提出的對話理論視野：

(一) 掌握關鍵時機，創造新語彙／思維

Heidlebaugh (2008) 指出公共對話理論與實踐可受益於語藝學之處，強調學者們應探索新方法，有效運用公共議題討論過程中所產生的矛盾張力 (tensions)，達到雙方構建新意義 (novel meanings) 的目標。他認為對話最重要的是「去蕪生新」，跳脫舊的思考模式，以不同的思維模式思考問題。Heidlebaugh 指出，吾人不僅應關注語言作為真實交流的媒介反思，也該以語言作為一種媒介來拆解舊的、慣性的對話結構。雙方需留意公共對話中可能出現的「關鍵時機」(kairotic)，藉此機會提出創新表述，或創造出挑戰主流意識形態的詞彙。

Kairos 體現了「強烈的偶然原則」(radical principle of occasionality)。因此，...「在突發的時間點做出反應」(to act always...on the spur of the moment)... 這種創造性活動會自我更新，並隨著它的發展和適應新環境而隨時發生變化。因此，*kairos* 強調了對新穎性和緊迫性的反應，如何迫使新語言的創造與發明(研究者翻譯)(White, 1987, p. 13-14；轉引自 Heidlebaugh, 2008)。

換言之，Heidlebaugh 強調，參與對話者應把握偶然、精準的時機，提供一種與對話雙方兼容的修辭方法，將其納入公共對話，強化參與者面對當前問題的表述能力，一種「創造新思維的可能性」(*Apate*, the art of the possible)。*Apate* 很難翻譯成其他語言，該語藝學的概念包括歪曲、欺瞞的意涵。於此脈絡下指的是，語言可發揮作用以創造新的現實，而不只是代表已經存在的現實 (Heidlebaugh, 2001)，本研究將其詮釋為「去舊出新」。置於本研究的脈絡下，研究者好奇，回應《反戰聲明》的投書能否藉此對話時機，帶

領讀者思索反戰學者的論述，並創造出另一條嶄新的思維路線？

（二）日常聊天，奠定對話基礎

Kim & Kim (2008) 提出兩個層次的審議式民主 (deliberative democracy)：一是工具式審議 (instrumental deliberation)，即一種程序性工具 (procedural tool)，人們通過它進行協商和做出決定；另一種是對話式審議或對話 (dialogic deliberation, or dialogue)，人們通過對話建構自我和他者的概念、社區意識與公共理性。Kim & Kim 認為日常與政治相關的聊天談話，可視為對話審議的基礎形式，乃是審議民主的基石。他們運用語言學的概念來說明對話的「顯性規則與隱性規範」(rules and norms)，通常是在聊天與談話的過程中逐漸養成，甚至是從小培養。

該研究指出，日常的政治談話也許不是一種理想或合理的審議，但它可能是公民建構和揭示身份、理解他人、制定審議規則、增強自身意見、改變彼此觀點的一種實用練習。日常聊天足以使家庭領域化身為公共領域，將私人生活與政治世界串連起來。Kim & Kim 將日常政治談話概念化為一種對話式審議，它是自發的、非正式的和非目的性的，因為對話沒有特定的目標或目的，它的作用是建構自我概念，達成相互理解，建立人際關係。對話不是策略性的「我—它」(I-it)關係，而是關係性的「我—你」(I-thou)連結。該研究的主張與哈伯馬斯(Habermas, 1984)的溝通行動及 Buber(1958, 1965)的對話概念相似，他們兩位都相信人類的理性並非一人可達，或能外存在一人的心中，而是透過個人與群體或兩人之間的互動，互為主體所生成。重點乃是人們願意在互動訊息不斷來回交流的過程中，更新自己的想法。

Kim & Kim (2008) 批評工具式審議觀點只關注政治體系 (政府、政治機構、正式公開會議等) 中的協商審議，重點是做出必要之決定 (decision making)。他們認為，日常的政治談話，看似微不足道、毫無理性可言，卻是生產與再生產公共理性、提升輿論質量的過程。根據哈伯馬斯(Habermas, 1984)的說法，「非正式和一般性對話，像是閒聊、談話和論辯都是溝通行動 (communicative action) 的實踐形式」(p. 327)，主要不是為了某種特定的目的。通過無目的的、非正式的談話，吾人實現了相互理解並建立了一

個詮釋的共同體，此乃理性生成的重要基礎，或可稱為「溝通連結共同體」(communicatively interconnected community)。換言之，只有說出來的想法，才能被確定究竟是否具備組織與邏輯性，也才有可能蛻變為更全面性的觀點。哈伯馬斯 (Habermas, 2006) 還提到，通過溝通行為者日常發生的政治閒聊與談話，人們其實已經長期暴露在一個不斷論理的學習空間中而不自知。

Kim & Kim (2008) 提醒，每日的聊天對話訓練，目的不是為了「改變」對方的立場，而是為了要提高意見內容與思考的「品質」。由此反思《反戰聲明》所激起的日常政治性談話，究竟有多少是為了要聽取非同溫層的意見？又有多少是企圖說服他人？國人是否具備以改善論點品質為前提的對話素養？我們又通過何種形式鍛鍊自身的對話素養？

(三) 說故事作為一種對話

Black (2008) 主張以「說故事」(storytelling) 來創造和激起對話的契機。該研究指出，對話過程中產生的矛盾與緊張 (tension) 多半來自於雙方所屬群體「認同上的矛盾」。有些人做出非理性的仇恨言論並非為了論理，而是為了捍衛自身群體所認同的價值，同時削弱另外一方的立場。因為群體成員對其所屬社會群體的認同與承諾，可能在對方的立場與主張中受到威脅，或與自身的社會群體利益出現對立。例如：國內同婚運動期間，反同團體便把自身的宗教與家庭認同的價值觀擺在優先位置 (相較於同志取得結婚的權益)，並且在與挺同團體進行論述碰撞的過程中，大肆強調彼此的差異。本研究相信，身份認同背後的歸屬感，那份社會群體所提供的安全感與被接納感，可能是人們忽視理性，為了它與他人惡言相向的原因之一。一旦人們所屬社群所重視的價值受到傷害，則原先被這個社群所認同與接納的自己，也似是跟著受到侵害，甚至消失。

思考團體溝通的討論形式與對話之間的關聯性之後，Black (2008) 指出，對話的確更強調多元意見的發聲、開放的心態、與人連結、及共同建構意義，但對話中並非完全不可見其他的溝通形式，如辯論、說服、討論。Black 不認為對話只會出現在由組織安排，有規劃、有具體步驟的溝通情境中；說故事作為一種邀請對話互動開啟的橋樑，能有效讓對方隨著故事情

節進入自身認同與換位，鬆動敵我對立意識，促使雙方展開對話：

講故事有助於參與者共同創造和展示他們彼此之間的身份，也使他們能夠想像和欣賞彼此的觀點。這些功能使講故事有可能實現對話時刻，因為它們允許小組成員協商他們互動中存在的自我與他人之間的緊張關係。……講故事可以實現一種觀點採納 (perspective taking)……理解他人觀點的合理性，即使彼此不盡然認同或接受對方的觀點 (研究者翻譯) (Black, 2008, pp. 95-96)。

相對地，審議式討論強調的是平等、公平、理性分析，同時聚焦在公共利益，因此審議式討論經常被挑戰只注重「理性層面」的論辯 (only legitimate form of deliberative discourse)，也可能導致少數族群因為不熟悉律法或公共體制而不得不噤聲。

簡言之，Black (2008) 的研究欲強調，說故事是一個可以表達「我是誰」的重要溝通活動，說故事允許互動雙方相互觀照彼此的身份認同。透過故事的講述，我們可以看見一個更加立體的人，及個人所經歷過的生命跌宕。參與對話者不該只是被他的想法或言論所代表，個體所隸屬的社會群體與價值信念更是形塑個人的重要來源。由此可見，網路上的某些敵對立場與仇恨言論的起點，或許正是因為網友不清楚自己所互動的對象是誰，亦從未理解過對方的生命故事。國內研究也曾發現，說故事在民主討論中有助於表達認同，降低弱勢群體的參與門檻，建立雙方信任 (范雲, 2010)。

總結文獻回顧，21 世紀的口語傳播與語藝研究，延續 19 世紀末古典理論家提出的對話核心理念，跳脫謹守理性思維的機械化論辯，強調人與人之間經由多元符號互動行為，所累積的信任連結與創新空間。本研究好奇，《反戰聲明》發佈之後所引起的一連串意圖「對話」的網路投書，是否展現出接近上述文獻所指稱的對話互動？欲回答此問題，本研究進一步提問：這些網路投書具體可見哪些溝通目的與書寫策略？其中是否可見對話理論所強調的重要主張與內涵？

參、研究方法

鑒於《反戰聲明》記者會召開一個月後，網路平台上的討論聲量大量遞減，本研究選擇自 2023 年 3 月 20 日至 4 月 30 日為止，網路媒體上評論《反戰聲明》的網路投書及其回應文作為分析文本。¹研究者以國人最常使用的 Google 搜尋引擎²，將「反戰聲明」作為搜尋之關鍵字，在未設定其他篩選條件下，尋得 30 篇論及《反戰聲明》的網路媒體投書（如附錄一），包括回應《反戰聲明》主張，以及反戰學者回應投書的文章。撰文者涵蓋學者、文字工作者、退休教授、與學生等。本研究並未因撰文者身份或網路平台的政治立場，針對投書進行挑選。蒐集到的投書內容較少見到同意《反戰聲明》的意見，或反戰學者之外的其他回應文，實為當時搜尋所獲的結果，並非本研究刻意增刪或迴避任何投書意見。

基於下列原因，本研究認為網路媒體投書為適合成為本研究分析之文本：首先，媒體投書必須載具實名，具有可問責性，能確切知曉對話的對象，雖然並非面對面交談，但可讓讀者得知發言所出何處，亦可透過線上查詢發言者的背景；再者，刊載於網路媒體的文章，可長時間留存並受公評，不似社群媒體上個人的帳號貼文，可隨時修改或刪文；長文的投書寫作比起其他網路平台上紛飛的訊息，有較低的去脈絡性。本文旨不在討論《反戰聲明》與其回應文所呈現的立場對錯，而是投書中呈現的溝通形式與目的。網路新聞媒體主筆室的回應文與新聞報導，並不涵括在本研究分析的範圍，因主筆室所發出的文章，作者並不明確，也可能是多人共筆，缺乏清楚的對話對象；新聞報導的內容則以事實為主，並非嘗試對話的個人見解。

¹ 本研究書寫的時程為 2023 年五月，後續雖再出現其他零星投書，為避免必須不斷更新研究結果，投稿過程中將不再增加 2023 年 4 月份之後刊登的其他網路投書。此為本研究侷限，並已在文末表明。

² 臺灣有超過 90% 的人慣用 Google 搜尋引擎，其次是 Yahoo 排名第二（臺北市廣告代理商業同業公會，2023 年 3 月 22 日）。

本研究採文本分析方法，其有助於流行文化與公共事務的探討，聚焦文本上下文的語境脈絡與意義建構的整體性，分析時特別側重文本訊息內容所欲傳達的溝通意義（夏春祥，1997）。因此，本研究依文本分析的學術關懷，以質性研究歸納的精神，實行以下分析步驟：（1）反覆檢閱 30 篇網路投書，進行編輯與初步確認文章溝通旨意；（2）閱讀的過程中針對不同的書寫策略進行編碼標記；（3）將編碼接近的書寫案例聚集之後，再度聚焦歸納出不同書寫策略類型，並依據投書上下文脈絡詮釋出其所欲達到的溝通目的，例如：蒐集投書中先論理後駁斥的例子，詮釋其溝通目的為推論聲明內容之不合理性；最後（4）指派「主題」（themes）來指稱與區辨不同目的類型，後續並選出最適合說明該主題的書寫策略例證，盡量在研究結果中呈現多元的投書內容。

肆、研究結果

投書者所展現的溝通目的可分為以下四種類型：（1）糾錯貶抑型、（2）提問對話型、（3）重新框架型、（4）自我辯駁型。以下，本研究將以溝通目的的分類探討投書者所使用的電子書寫策略。

一、糾錯貶抑型

許多投書大量引用《反戰聲明》中的觀點，以論理的方式指出其不合邏輯之處並加以駁斥。其內文談到「反戰」與「反侵略」的差別、「等距外交」的不可行、聲明內容「輕放中共與俄羅斯」等觀點。例如：汪浩（評論員）指反戰學者一面提出需要與美中等距，卻又害怕後續被中國制裁，不願為文批判中國，實為雙重標準之舉。

你們在自由世界享受言論自由，批評美國天經地義，還有媒體和學術界的光環；但批評中共卻要承擔不能去中國訪問、開會、出版的後果。希望你們也拿出道德勇氣，像批評美國一樣，好好批評一下中國，這樣才能與美中保持等距吧（5，汪浩，評論員）！

盧郁佳（作家）則是用比喻的手法，指出《反戰聲明》責怪受害者之

不合理，不斷提出疑美的警告聲，但卻欠缺說明中共比美國更為可信的原因，讓人很難被說服：

所以聲明當然不是怪北約，是怪烏克蘭抵抗侵略。阿嬤帶孫，孫子咬了孫女的手臂，阿嬤就罵孫女「為什麼不穿長袖」。聲明說期待理性討論，可是聲明本身的理性沒有超過這位重男輕女溺愛孫子的阿嬤，兩者都在指責受害者該為戰爭負責，主張投降是被侵略者應盡的義務，北約軍援大大妨礙了烏克蘭盡此義務。其實聲明也指責美國侵略伊拉克、阿富汗，請問照聲明鼓吹「核彈之下無主權」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為什麼不是伊拉克、阿富汗應該自責失職且立刻投降？如果「核彈之下無主權」，為什麼不是中共應該怕美國核彈？聲明要求理性討論，那麼別人回應中共不可信，主張和談者就應該舉例證明中共為何可信，為何值得臺灣和談，如何才能解決中共背信的風險（9，盧郁佳，作家）。

不過，這一類投書一邊舉出聲明中隱含的錯誤，一邊可見以下幾種書寫策略重複出現：（1）詰問：全篇不斷質疑聲明內容，滿佈質問句，暗指道理不證自明。

如果是反對美國幫助臺灣跟中共打戰，這些教授們不是說「臺灣不要當棋子」、「不要幫美國打代理戰爭，不要當炮灰」等等嗎？那好，美國聽你的，兵也不派，武器也不給，臺灣自己打，不是說「臺灣要自主」嗎？請問臺灣「單打中共」，挺得住嗎？.....如果挺不住，如果連臺灣「單打中共」也要反戰，那就只能選擇「和平談判」一途，試問，「一國兩制」你接受嗎？有沒有人可以指出，除了「一國兩制」之外還有什麼可行的方案？如果沒有，但又不接受「一國兩制」，那中共會不會打臺灣？至今為止，有沒有人可以證明中共一定不會打臺灣（10，宋國誠，研究員）。

從國民黨潛在的總統候選人侯友宜在元旦拋出的棋子說，到如今學者們的反戰聲明，都忽視了一個最簡單的道理：為什麼反

抗中國侵略，拒絕被一個反民主、反人權、反多元價值觀的國家統治，不能是臺灣人自己的想法，而必然是受到美國人的煽動？為什麼只有你的看法是中立客觀，而其他不同的看法就是受到蠱惑（6，林艾德，作家）？

（2）貼標籤：有些投書者使用了「綏靖主義」、「反戰等於投降」（施芳瓏，研究員）、「偽中立者骨子裡喜歡獨裁者」（林艾德，作家）等說法，將反戰學者直接歸為與現實脫節的投降派。

臺灣島上只要心智正常的住民，大概都知道對岸對臺灣的恐嚇與領土野心。……無論反戰論者多麼想極力辯解，只要細究他們的反戰主張，都不難發現就是投降的體面說法而已。畢竟直接向處於戰爭邊緣的社會倡議投降，實在是件懦弱、有失格調、太 low 的事了，講「反戰」多麼清新而脫俗啊，然而這也意味著事不關己與脫離現實（29，陳信仲，博士生）。

（3）人身攻擊：投書者夾雜使用情緒性字眼與段落來詆毀、反諷反戰學者，如：「左派幼稚病」（宋國誠，研究員）、「看似和平、理性，實則鄉愿、無知」（陳立民，會計師）。這一類的投書並不少，例如：

我對說服他們沒有興趣，因為他們沒有道德勇氣。他們沒有批評入侵者俄國、威脅者中國，卻批評對被入侵者烏克蘭、被威脅者臺灣提供支援的美國。這種人在一般鄉里生活，不僅被唾棄，甚至被當面羞辱。有人說他們是好人、有高尚的學問，目前僅是認知上有點問題而已。一般鄉里對此的反應，就是：我的小孩讓他們教，會不會越教越笨？笨到不會抓癢……哈佛大學校長說：「大學教育的目的在讓人知道誰在胡說八道。」是的。但他還有一個前提，就是：大學教育的施教者，不能是一群精專於胡說八道的人（22，林修正，退休教授）。

林艾德（作家）的投書直指反戰學者「自以為是上帝的學者之眼」，實際上是崇拜菁英與獨裁的「偽中立者」，可惜這些針對反戰學者的指控流於情緒化的自我表態，從前後文看來實有過度推論之嫌：

我必定要先謝謝盧老師的「提醒」，大概是我們腦袋都燒壞了，才不知道美國、或者說世界上所有國家都會以自身利益為優先。就這麼簡單的觀點，也能說得好像什麼真知灼見。有時我會羨慕起這些年紀兩倍於我的前輩，究竟是什麼樣的好運，可以讓人一輩子活得如此天真？.....我始終對這種高高在上的學者或政黨反感，因為即使他們滿嘴的民主、自由與人權，但他們實際上信仰的卻是菁英與獨裁。一旦我們接受這種概念，相信民主或政黨政治始終會做出最爛的決定，那麼是由誰來獨裁似乎也不是那麼重要了。獨裁者最喜歡這樣的偽中立者，就像這些偽中立者們，骨子裡喜歡獨裁者一樣（6，林艾德，作家）。

施芳瓏（研究員）攻擊反戰學者郭力昕的段落更是如此寫道：

這是「憑著膝蓋想」都可以明白的道理，那為什麼對這麼「獨立」的學者，「思考」清楚這主格或受格的邏輯，有這麼難嗎？從不接地氣，所謂的「自命清高」。.....「要清高就清高到底唄」（15，施芳瓏，研究員）。

李志銘（作家）使用激化衝突的辱罵語言來形容四位學者，像是使用日本的用語「和平笨蛋」來指稱缺乏防衛意識的人，還說他們是「傻氣的書生講得頭頭是道」；張宇韶（研究員）批判他們「充其量就是一群玻璃心的左膠蛋頭」、「不是天真可笑，就是愚昧無知！」黎蝸藤（學者）更是直接稱呼他們就是不讀書的「臺灣挺俄四醜」；汪浩（評論員）在其投書的末尾放上「祝四位身體健康，學業進步」，這個說詞也被許多反對反戰派使用在臉書的揶揄嘲諷貼文中。丘琦欣（作家）雖然回應了反戰學者的疑美論點，文末也強調即便聲明有理也無需四位學者「贅言」，全文使用了很多貶抑、

拒斥的語詞來批評四位學者及其觀點。

這一切全都說明了曾經成就輝煌，如今卻已停滯不前的一整代運動者，變得與時代毫不相干——不論杭士基、呂秀蓮，還是臺灣反戰聲明工作小組成員。盡快把他們和他們的觀念從世界史舞台上撤除，扔進歷史的垃圾桶，或許才是最好的（1，丘琦欣，作家）。

依上述舉證，糾錯貶抑為溝通目的的投書，以一刀切的二分法，毫不留情地將反戰學者打入「錯誤的一邊」，恐難促進雙方傾聽的意願。更遑論投書中夾雜人身攻擊、貶抑、過度推論與流於情緒宣洩的表述，越是加深《反戰聲明》及其反對方彼此之間的極化與對立。

二、提問對話型

即便所持的立場不同，仍有投書者展現誠意，試圖理解反戰聲明中的重要觀點，再從雙方同意的基礎上向反戰學者們懇切地提問與產生連結。黃厚銘（教授）在文中先將自己的聽見與理解描繪出來，接著再闡述自身的論點。他在投書的首段便提示大家應該謹慎看待《反戰聲明》，避免淪於無益的攻擊與謾罵：

基於起草學者們的學術地位，以及其中幾位先進過去在臺灣社會或學術體制改革等進步議題上曾經發揮的作用，個人覺得有必要認真看待他們的說法，而非人身攻擊或謾罵、貼標籤式的反彈（3，黃厚銘，教授）。

黃厚銘特別點出自己「聽見」了反戰聲明對中國的譴責：

為了避免言論失衡的批評，〔反戰〕聲明的末尾特地說明，並非無視中國對臺灣的打壓與武力威脅，而是不想重複臺灣媒體隨處可見的論點。且再次以智慧兩字期待臺灣能找出在美中對抗下

的自處之道（3，黃厚銘，教授）。

他明確指出，自己同意聲明稿中有關「反美帝」的主張：

我當然相信美國的所作所為，都是基於自己的國家利益——甚至，所謂「國家利益」是不是真的就是美國人民的利益，也可以有爭議的空間，因此，要批判「美帝」並不是不行（3，黃厚銘，教授）。

後文中他又說道：「在此對抗格局中，不僅美國是帝國主義，中國也是帝國主義，正如俄烏戰爭中的俄國亦是如此。」以此說法讓反戰學者明白，如果他們反美帝，那麼同理，應該也無法贊同「中帝」與「俄帝」。此乃順著反戰方原本的主張脈絡進行邏輯上的延伸，藉此拉近反戰學者與自己的觀點。

黃厚銘除了認同當心美國的觀點以外，同時非常巧妙地提出「強化國防不是挑釁，而是企圖阻止戰爭的發生，這也是另一種意義下的反戰。」以此說法將自己與反戰方的觀點連結在一起，不似其他投書者直接劃開「反戰」與「反侵略」雙方的理念與立場。他甚至考量到四位學者未來的處境，以對方的利益為出發點來發言：「我相信，被中國統一的臺灣，即便是臺灣的左派學者也一樣會失去批判的權利。」而不是將反戰學者劃為他者。他小心翼翼地勸戒對方：

無視臺灣人民不願接受中國極權統治的意向，以及片面忽略俄國與中國的帝國主義行為，反而更可能不利於臺灣左派推廣其他真正具有參考價值的思想與訴求，並削弱其政治影響力（3，黃厚銘，教授）。

黃厚銘的這篇文章也同時刊登在《信傳媒》上，內文與上述完全相同，唯獨標題與首段的內容有別。他在該文的第一段便動之以情，點明自己與反戰學者們的關係與連結，並不吝於表達自己當時複雜的心情，以及期待對話的可能性。

這是一篇動筆起來心情很沉重的文章。因為起草「反戰聲明」的作者中，有兩位我一定得稱他們為老師，他們要不是我的博士論文口試委員，要不就是我在大學時旁聽過不只一門課的老師。以及，還有一位是我向來景仰並持續密切往來至今的前輩同仁。其中有在臺灣民主運動中的前輩，甚至也有在某些社會議題或公共事務上曾經給我個人支持、和我一同抗爭奮鬥的伙伴。或許等到連署名單公布，還會有更多我的朋友列名其中。但也是基於對他們的尊敬與信任，我相信這樣的對話是可以被容許的。同時也是我響應聲明裡所期待集眾人之智慧，尋找臺灣自處之道的具體行動（14，黃厚銘，教授）。

這樣的開頭表達的是黃厚銘對四位學者的敬重，也再度重申文中的討論是針對彼此慎思過後的主張。即便雙方不一定互相贊同，但是仍然相信彼此可以藉著文字交換來就事論事、互相討教。

楊德涵、饒辰書（大學生）同樣不贊成反戰聲明，但是他們在投書中試圖去理解反戰聲明，正視疑美論，嘗試把兩邊的立場往中間拉聚。他們指出，反戰學者反對的是「狹義的」自由主義，也就是以美國為中心的自由主義。

細究反戰聲明後發現，學者相當在意「臺灣主體性」，為了讓臺灣不受制於美國、淪於美中對抗下的犧牲品，所以訴求臺灣「自主」，但又因為需要抵抗中國矮化打壓及武力威脅，於是希望與各個友好國家都採取等距的外交關係。.....從這個角度來看，學者其實不真的反對美國的主張，依然在追求「自由主義」內涵的框架，只是不希望臺灣一味用「狹義的」定義，以為要追求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僅有倚靠美國這一選項（27，楊德涵、饒辰書，大學生）。

他們並不認為把反戰學者打成「中共同路人」是一個好的策略。反戰學者並未否認中國打壓，也並非想要放棄目前國內的民主體制，只不過希望「提醒」臺灣人不要過度倚美，他們認為這才是聲明的初衷。

楊德涵、饒辰書認為反戰學者所言與政治學者吳介民的反侵略其實是很接近的概念。兩人最後提出的結論是，吳介民的主張是對美中台務實的想像，而反戰聲明則是提出一個長遠來說，臺灣可以如何更多元反思的「不一樣的想像」。換言之，楊德涵與饒辰書全文欲強調的是反戰聲明與其反對方一樣「在意臺灣」的共同點，現階段不應該將這份聲明當成是投降主義。

此外，傅大為作為反戰聲明的四位學者之一，撰有兩篇回應文投書。其一〈一封反反戰朋友的好意來信〉針對雙方陣營的共同點進行闡釋：「和平保台」與「反侵略的再思考」。他嘗試對話，首先提出自己贊成反對方的觀點：「說到保台，我們反戰者當然是贊成的。但重點是如何保台的細節。」接著他主張：「要保台就不要挑釁，要和談，不要跟著美國起舞。」試圖區別反戰與反侵略的不同，並質疑單一目的「努力備戰以反侵略」所呈現的問題與盲點。傅大為也在文中批判中國：

反戰非但不與國軍保衛臺灣衝突，更是保台的前提。這不是單純的疑美，而是積極的為了臺灣和平、保台，而批評好戰又挑釁的美國霸權，同時也要批評中國不要動輒對台軍演並拋出武統的威脅（24，傅大為，教授）。

他提出自己的反侵略圖像：「在反戰—和平—保台的架構下，我覺得一個經過再詮釋的『反侵略』仍然有其階段性的意義。」可惜他願意朝反侵略派靠近的「反戰三階段推演」並不被反對方所認同，反倒遭受嚴重訕笑與批判。該份回應文可見傅大為放出對話的探針，挑出反對方的幾個重要觀點，說明其與自身觀點的接近性，批評中國不斷武力威脅。

三、重新框架型

另有二位投書者，不以聚焦反戰聲明論點為主要討論方向，而是發展出一套自己論述的主軸，重新定位《反戰聲明》的價值。他們並不花費篇幅反駁反戰的對立方，而是藉著投書說明自己的其他主張。王顯中（記者）以幽默、結合時事的筆觸，描述反戰聲明備受「花式吐槽」，相關的批評如排山倒海而來，幾乎可以出版「反反戰小冊子」：「讓 AI 自動生成一份〔反

戰聲明〕論述缺陷大肆宣揚（不過中共封鎖了 Chat GPT，可能得用「文心一言」...）」。

王顥中指出，中國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與臺灣的反戰小組共同點都是「敢言別人所不敢言」。他以卡通人物「胖虎和大雄」的比喻，說明世界各國往往都覺得「自己是大雄」，也就是被欺負的一方。他的書寫用意是提醒讀者，小心以單一面向的觀點思考，鼓勵大家跳出原本爭執的框架，用其他視角詮釋《反戰聲明》：

反戰運動應該是一場向內自省的運動，一場向自己社群內部鷹派喊話、讓對外敵意降溫的運動，也就是看到自己除了是大雄以外，也可能曾經扮演過胖虎或其幫兇。要促成區域的和平，必須是區域間反戰派的合作與交流才可能達成，各自約束自身國家／陣營內部的主戰派（7，王顥中，記者）。

王顥中從聲明中延伸創造的觀點是：如果各國都願意反思，妥善控制自己國家內主戰的陣營，不管是中、美、俄、臺，必能發揮其正面積極的和平效果。他最後以其他國家的反戰群體與臺灣的反戰小組做比較，希望激起大家思考自己是否也曾有過「為虎（美）作倀」（成為胖虎）的時刻。

楊儒賓（學者）亦試圖創造新的視角來詮釋反戰聲明。他認為說到底，「各國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真正犯錯的是中共僵硬的對台政策」。他在首段便提到反戰學者們之前在解嚴上的貢獻，並稱這篇聲明有其價值。接著他嘗試強化反戰聲明疑美論合理之處，主張「疑美、和美，而不反美」，其論理的方式將反戰的觀點鋪陳為可以和反對方一起放在檯面上思考的選項，雙方不一定要針鋒相對或勢不兩立：

美國政府官員也有鴿派、鷹派之分，同樣是官員，「不要讓中共斷了有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卜睿哲）是一種提案，這是和平路線；「臺灣家家有步槍，海灘上區區佈地雷」也是提案，這是戰狼路線。臺灣未必沒有選擇，和美、疑美兩種觀點或許不一定矛盾（30，楊儒賓，學者）。

他又以中美斷交的歷史事件來證明：美國一直以來也是為了自身的利益，臺灣也是為了自身利益，兩者都是為了對抗中國武力犯台，而這一點是反戰派與其反對者都同意的，並以此共同點拉近與反反戰派的距離。楊儒賓認為，問題永遠出在「局勢」而不是誰是絕對的好人或絕對的壞人：

臺灣如果沒有錯，美國錯了嗎？美國依自己的國家利益作抉擇，何錯之有！如果雙方都沒有錯，但臺灣的國家利益卻受到空前的損害，問題也許是客觀局勢造成的，無關於善良與否的動機。面對前科累累的新歡兼舊愛，臺灣為自己考慮，朝野調整一下「親美」的步驟，冷靜而不「狂熱而喧囂」地正視局勢，應當是合理的態度（30，楊儒賓，學者）。

他指出真正的罪人應該是「中共無法正視中華民國，導致對台政策的僵硬」（而非反戰四人），其使得「和中」、「反戰」這些積極的呼籲引發激烈爭辯。以目前局勢，不跟中國接觸是不可能的，如果是這樣，何不讓臺灣人反過來自己決定該如何疑美而不反美，更寬廣地定義臺灣與中國經濟面、文化面與血緣面的連結，避免落入主權國家口號的大黑洞。楊儒賓在文中並未責怪或反對任何一方，而是試圖促成國人能夠在此議題上走出第三條路。

四、自我辯駁型

《反戰聲明》的作者中，有三位挑選某幾篇投書進行回應。其回應的方式首先感謝公民提出意見，內容主要專注在捍衛自身的觀點。郭力昕的回應文首段提到《反戰聲明》曾參酌反對意見：

參考了一些認同或不甚同意此聲明文字的朋友們善意的修訂意見，成為最後在記者會上發佈的版本。謝謝那些為公共事務經常並肩發聲、但不能完全認同這份聲明的朋友們，站在各自不同的政治立場，耐心、理性地提出他們的看法。這也是此反戰聲明最主要的一個期待：臺灣公民社會能夠對目前的嚴峻處境進行

公共對話與論辯，讓民眾聽到多元的意見（19，郭力昕，學者）。

郭力昕承認《反戰聲明》並非沒有需要被批評之處。他強調聲明稿並未做到面面俱到，解釋聲明稿也是個協商的結果，不盡然是所有人的共識。但是他認為反戰小組被評為過度天真、缺乏現實感，統獨兩極的集體謾罵、扣帽，與他們原先想要激起的社會討論相去甚遠。

接下來郭力昕針對其他回應文予以辯駁，其捍衛自己的方式包括：強調自己不是無視中國威脅，而是想提醒其他帝國主義視野；點名辜寬敏是投降者，成令方教授太過天真、缺乏現實感；指出獨派反對方仇視中國人；最後說明自己也討厭霸凌，但是質疑反對方受情感操弄，沒看清楚現實。全文從疑美論轉而提到臺灣人想成為美國的第 51 州，臺灣人喜歡川普和歐布萊恩等。最後他指陳臺灣雖有言論自由，但是卻不能自由說話，批判媒體製造無知。

此外，馮建三回應趙君朔（作家）的投書，一開始承認自身觀點不可能完美，接著說道雙方難免都可能有疏漏之處。馮建三該篇回應文主要在——辯駁反對方所提出的論點，文中也使用了許多「反詰」的書寫策略：

為了減少對岸敵意，我們說我們的政治身分，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完全正確，但在文化與歷史內涵，我們說自己是中國人，不也是緩和兩岸緊張關係的一個可能作法嗎？即便這是小小的一步，也不是關鍵的一步，但既然「不以善小而不為」，我們何不強調，積跬步至千里的自我惕勵？卜睿哲又說，對岸不會主動講，但臺灣若願意提出邦聯或類似的模式作為兩岸關係的引導，雖然是險棋，對臺灣會有任何不利嗎（26，馮建三，教授）？

馮建三強調自己「並沒有視而不見其他意見或判斷的存在」，但其回應文仍著重在捍衛自身的觀點，並且由於互文性很高（引用研究、專書和報導），而較難讓一般讀者理解，甚或起到對話的作用。

伍、結論與討論

人類社會的自由對話，為我們提供了思考用的想法元素，從而提高個人論點的品質。在反思與討論某個問題的想法之前，人們通常不會意識到彼此可能持有相互矛盾的意見；唯有當人們通過發言表達意見時，才會嘗試以更具邏輯連貫的方式組織自身的主張，也才能檢驗個人的想法是否合理（Kim & Kim, 2008）。而自由對話真正產生作用的契機，往往就在表達、吸取他人意見，與反思自我論點的過程中發生。

非實體、缺乏關係間基本信任的社群媒體互動特質，使得網路平台上進行有效對話更加困難，其造成意見交流者受攻擊或辱罵的風險也更高（Theunissen, 2015）。然而人類本有向外溝通的慾望，現代人已經從過去的實體見面討論，因著科技的更新與去中心化的特質，無以回頭地移往網路社交平台上進行。碎片式、非同步的短訊留言難以聚焦議題，網路上的其他交流互動是否仍有可能產生對話理論所強調的「互相連結」與「願意調整自身立場」的傾向？

本研究以《反戰聲明》公布後的網路長文投書為文本案例，分析後發現回應反戰聲明的第一類「糾錯貶抑」型投書，在看似理性批判的外表下，偷渡諸多貶抑與人身攻擊，實已偏離言論自由所保障的範籌。即便其觀點或有可取之處，但極化二分的文字易激起負面情緒，難以填補被挑戰者的理性認知差距。這一類投書撇除攻擊性言詞，較像是進行 Buber (1958, 1965) 所謂的「獨白」或 Bohm (1996) 所謂的「資訊交換」：發言者不但看不見對方的脈絡，反而急著挑出對方的錯誤，未見傾聽理解或調整自己的意願。

這類扣帽子、貼標籤或惡意中傷等貶抑的語言行為，明顯在過程中將自己與對方畫出「我群」(in-group)與「他群」(out-group)的界線(boundary)，使雙方落入（我是）好人對抗（他是）壞人的戰爭，無助於社會對話與融合。過去有關兩岸大學生社會認同差異的研究指出（李佩雯，2014），兩岸學生因族群與國族等跨群體（intergroup）立場相異，使雙方傾向為自己所隸屬的群體做出正面推論與歸因，合理化自身的行為與價值觀。過分劃界者也可能因為厭斥對方群體，而產生隔離、將對方貶為素質落後的他者。此外，糾錯貶抑型的投書者必須小心誤入常見的「基本歸因謬誤」（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Ross, 1977），高估行為背後的個人性格因素（如：對方思慮不清），而低估個人成長環境或經驗（如：對方所屬社會

群體的影響)等因素,最終導致個體難以同理或傾聽他人相左的意見。

第二類「提問對話」溝通模式,近似 Buber (1958, 1965) 所強調的「我一你」(I-thou) 連結性,亦即將自我與彼方視為一體,試圖相互扣連。此類型投書者即便不同意《反戰聲明》,仍傾向於在文中先定位自己與反戰學者的關係,再從彼方所提的不同意見出發,將之與自身的觀點連結;在思考自我立場的同時,不忘對方的處境,甚至提醒對方在該立場下可能遭遇的危險。這一類投書者統整彼此的立論觀點,企圖提出融合、補足雙方意見的思考。他們刻意模糊雙方的界線,正視「我是誰」以及「他是誰」的人際脈絡,以嘗試「幫對方說話」的口吻邀請對方加入自己的陣營。此時,投書的內涵呈現的是彼此互為主體的過程,因對話而產生「我和你乃社會共同體」的心意,且透露出欲繼續開放討論的意願。這一類的對話者,將彼此看成有故事而立體的人(Black, 2008),對話的主體不只是一篇聲明稿,不僅是一場理性科學的論辯,更是一群背後有著特定社會認同信念,曾經享有共同價值的學術先行者。

第三類「重新框架」型,投書者並未落入不斷為自身立場辯駁的漩渦。這類投書者雖傾向同意《反戰聲明》的論點,但在表達論述時仍創造出如:「大雄與胖虎」的修辭比喻,引導反對方從新的角度換位思索該事件;強調錯誤不在是否反戰的任何一方,而是中國強硬的態度。這些就雙方論點本身再度進行空間創造與再框架(reframe)的策略,可避免雙方陷入狹隘的「隧道效應」(tunnel effect) (Burke, 1952),其與 Gadamer (1975/2004, 1976) 以及 Heidebaugh (2008) 所提的適時創造新思維、新語藝的可能性 (Apate, the art of the possible) 亦可相互比擬。此類型投書數量雖有限,卻有助於讀者思索跳脫「選邊站」的糾結窘境,從討論中展現對話激起的多元思考,以及想法幅員的拓展。

第四類「自我辯駁」型回應,似乎是在面對非理性的反對聲浪時所產生的一種自說自話:急於捍衛自身立場,但其所提出與反對方相互連結的回應仍顯不足。其中所包含的人身攻擊式回嘴策略,問題通常在於透過威嚇、脅迫或貶損等方式,削弱人們進行更多元討論的意願。本研究推測,反戰學者可能因承受大量負面回應而不慎陷入「情緒推理的謬誤」(Lukianoff & Haidt, 2018),過度放大極端情緒性的回饋,結果反而無法在

回應中針對反對者投書中值得參考的部分進行深入探討與延伸。

承上，本研究分析的 30 篇投書，其中僅有少數反映出西方對話理論的內涵，如類型二與三。網路媒體上藉由長文投書的對話實踐並非完全不可能，但佔多數投書的類型一以及反戰學者的回應文類型四，凸顯國人針對公共議題的線上交流恐怕仍以「不對話」或「自說自話」為主流。如 Young (1990, 2000) 所言，多數人習於使用「審議民主」的方式進行對話討論，以「實質邏輯」(substantive logic) 而非「關係邏輯」(relational logic) 來看待對話彼方。實質邏輯凸顯明確的團體界線，各個團體都被區分在一個絕對的框架中，以符合外界看待個人及其所屬團體的刻板定型。關係邏輯則認為個人或團體間並沒有明確的身份界線，同一團體的成員也可能與外團體成員在某些部分相似，某些部分不同。過分強調實質邏輯的結果是，對話等同於畫界，當雙方觀點不一致時，便將對方打成「他者」，之後演變成道不同不相為謀。

最後，本研究欲藉哲學家約翰密爾 (John Stuart Mill) 的經典論著《論自由》(Mill, 1859 / 程崇華譯, 1986)，針對線上異議對話可能出現的盲點與誤解提出建議。其一，約翰密爾 (同上引) 提到：

人們既已承認對於一切可能「有疑的」題目都應有自由討論，卻又如此篤定特定原則或教義？實在是「他們確信」如此，故認為不得加以質疑；而還自以為自身認定的原則與教義不可能錯誤。須知，對於任何命題，就算只有一個人不認同就該否認其為確定，這時我們若逕稱為確定，那就等於把我們自己和同意於我們的人們假設為對於確定性的裁判者，並且是不聽他方意見的裁判者(研究者改寫本書中文翻譯，頁 24)。³

以本研究的《反戰聲明》情境論之，網路上許多貿然出言「全盤否定」他人意見的投書，完全不加思索自身對該命題所持主張可能有其不確定性。

³ 《論自由》的中文版翻譯因年代的關係，讀來較為艱澀，故研究者依據前後文脈絡改寫，期望有助於讀者理解該引文段落。

此時倘若反對方受攻擊式言論波及而跟著火冒三丈，負面情緒交互循環的結果，將導致彼此惡言相向，反而疏忽了言論自由的本意應是能互相矯正錯誤，共同邁向真理。

其二，網路上常見的互動謬誤亦可從約翰密爾（Mill, 1986）的說明理解之：

有兩種相互衝突的教義，不是此為真確彼為謬誤，而是共同分有介於二者之間的真理；公認的教義既僅體現真理的一部分，於是就需要不合的意見來補足其所遺。……甚至在〔意見的旋轉〕前進運動中，那本當是累加性的，大部分也只是由一個偏而不全的真理去代替另一個偏而不全的真理；而進步之處主要只在新的真理片段比它所代替的東西更見需要，更為適合於時代的需求罷了。既然即使站在真確基礎上的得勢意見也都具有這樣的偏缺性質，所以我們就應當珍視凡為通行意見所略去而本身卻多少體現部分真理的一切意見，不論其真理當中可能交織著多少錯誤和混亂（頁 52）。

本研究所分析之網路投書正是這樣的例子。不管是反戰學者，或其他反對意見者提出的想法與主張，皆秉持著促成臺灣和平永續的目標。只是在張貼聲明、開記者會或投書網路媒體的當下，是否掌握言論自由與對話的真義：雙方意見交換為的是互補不足，真理越辯越明本是累加。簡言之，言論自由的實踐本是在激發多元觀點的同時，秉持著個人論點的可被質疑性，藉著一次又一次論證雙方的意見，補上彼此觀點之不足，以求越加接近共同追求的真理。

總結上述，本研究主張異議對話過程中應能彼此連結，相互容錯，互補論點。本文建議跨立場的對話溝通，宜在各個年齡層的日常生活、線上線下，與教學現場中不斷實踐演練。《反戰聲明》所帶來的媒體報導聲浪雖已趨減，但後續社群媒體上的個人留言討論依然持續。本研究僅能就事發當下一個月左右的網路投書往來進行分析初探，實為其限制。

參考文獻

- 李佩雯(2014)。*〈我群與他群：兩岸學生社會認同差異之跨群體溝通研究〉*，《傳播研究與實踐》，4（1），129-171。
- 沈錦惠（2007）。《電子語藝與公共溝通》。五南。
- 范雲（2010）。〈說故事與民主討論——一個公民社會內部族群對話論壇的分析〉，《臺灣民主季刊》，7（1），65-105。
- 夏春祥（1997）。〈文本分析與傳播研究〉。《新聞學研究》，54，141-166。
- 曹家榮（2023）。〈重組 PTT、Facebook 與 Dcard 的平臺運作與公共討論：新物質主義取徑的分析〉，《傳播研究與實踐》，13（1），1-35。
- 程崇華譯(1986)。《論自由》。唐山出版社。(原書 Mill, J. S. [1859]. *On Liberty*. Broadview Press.
- 費翠(2012)。*〈從斧鑿真理的縱深到尋訪生活的樣態：言說者定義的轉變〉*。《傳播研究與實踐》，2（2），179-207。
- 臺北市廣告代理商業同業公會（2023 年 3 月 22 日）。〈觀點分享 2023 臺灣最新網路使用報告網路使用報告！8 大數據亮點一次看〉。上網日期：2023 年 12 月 27 日，取自 <http://www.taaa.org.tw/news/article/8562>
- Anderson, R., Baxter, L. A., & Cissna, K. N. (2004). Texts and contexts of dialogue. In R. Anderson, L. A. Baxter, & K. N. Cissna (Eds.), *Dialogue: Theorizing difference in communication studies* (pp. 1–18). Sage.
- Anderson, R., Cissna, K. N., & Arnett, R. C. (Eds.). (1994). *The reach of dialogue: Confirmation, voice, and community*. Hampton Press.
- Anderson, R., & Cissna, K. N. (2008). Fresh perspectives in dialogue theory. *Communication Theory*, 18, 1-4.
- Asakavičiūtė, V. & Valatka, V. (2020). Martin Buber's dialogical communication: Life as an existential dialogue. *Filosofija. Sociologija*, 31, 51-60.
- Barth, E. M., & Krabbe, E. C. W. (1982). *From axiom to dialogue: A philosophical study of logics and argumentation*. De Gruyter.
- Burke, L. (1952). On the tunnel effect.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4 (3), 121–138.

- Black, L. (2008). Deliberation, storytelling, and dialogic moments. *Communication Theory, 18*, 93-116.
- Bohm, D. (1996). *On dialogue*. NRoutledge.
- Buber, M. (1958). *I and Thou*. Scriber Classics.
- Buber, M. (1965). *The knowledge of man: Selected essays*. Harper & Row.
- Cissna, K. N., & Anderson, R. (1994). Communication and the ground of dialogue. In R. Anderson, K. N. Cissna, & R. C. Arnett (Eds.), *The reach of dialogue: Confirmation, voice, and community* (pp. 9-30). Hampton.
- Cissna, K. (2000). Appli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the 21st century. *Journal of Appli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8*, 169-173.
- Filatova^a, O., & Volkovskii^a, D. (2021, June 24-26). *Online deliberation on social media as a form of public dialogue in Russia Olga* [Paper presentation]. IMS 202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ternet and Modern Society", St. Petersburg, Russia.
- Foss, S. K. (2009). Invitational rhetoric. In S. W. Littlejohn & K. A. Foss (Eds.), *Encyclopedia of communication theory* (Vol. 1, pp. 369-371). Sage.
- Foss, S. K., & Griffin, C. L. (1995). Beyond persuasion: A proposal for an invitation rhetoric.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62*, 2-18.
- Gadamer, H. (1975/2004). *Truth and method* (J. Weinsheimer & D. G. Marshall Eds). Continuum.
- Gadamer, H. (1976). On the scope and function of hermeneutical reflection 1967. In D. E. Linge (Ed.), *Hans-Georg Gadamer: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pp. 18-43).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lenn, P. & Kuttner, R., (2013). Dialogue, dispute resolution, and talk-in-interaction: On empirical studies of ephemeral phenomena, *Negotiation and Conflict Management Research, 6*(1), 13-31.
- Habermas, J. (1984). *A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Beacon Press.
- Habermas, J. (1987).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2: Lifeworld and system: A critique of functionalist reason*. Bacon Press.
- Habermas, J. (1992). *Autonomy and solidarity: Interviews with Jürgen Habermas*.

Verso Books.

- Habermas, J. (2006).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media Society: Does democracy still enjoy an epistemic dimension? The impact of normative theory on empirical research. *Communication Theory*, 16(4), 411–426.
- Heidlebaugh, N. J. (2001). *Judgment, rhetoric, and the problem of incommensurability: Recalling practical wisdom*.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 Heidlebaugh, N.J. (2008). Invention and public dialogue: Lessons from rhetorical theories. *Communication Theory*, 18, 27-50.
- Kim, J., & Kim, E. J. (2008). Theorizing dialogic deliberation: Everyday political talk as communicative action and dialogue. *Communication Theory*, 18(1), 51-70.
- Lane, A. & Bartlett, J. (2016). Why dialogic principles don't make it in practice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0, 4074-4094.
- Lukianoff, G., & Haidt, J. (2018). *The coddl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How good intentions and bad ideas are setting up a generation for failure*. Penguin Publishing Group.
- Pearce, W. B., & Pearce, K. A. (2004). Taking a communication perspective on dialogue. In R. Anderson, L. A. Baxter, & K. N. Cissna (Eds.), *Dialogue: Theorizing difference in communication studies* (pp. 39-56). Sage.
- Ross, L. (1977). The intuitive psychologist and his shortcomings: Distortions in the attribution process.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0, 173-220.
- Theunissen, P. (2015). The quantum entanglement of dialogue and persuasion in social media: Introducing the per-di principle. *Atlantic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3(1), 5-18.
- White, E. C. (1987). *Kaironomia: On the Will-to-Invent*.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Witschge, T. (2008). Examining online public discourse in context: A mixed method approach. *Javnost-The Public*, 15(2), 75-92.

- Wood, J. T. (2004). Foreword: Entering into dialogue. In R. Anderson, L. A. Baxter, & K. N. Cissna (Eds.), *Dialogue: Theorizing difference in communication studies* (pp. xv–xxiii). Sage.
- Young, I. M. (1990).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Young, I. M. (2000). *Inclusion and democra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Zappen, J. P. (2004). *The rebirth of dialogue: Bakhtin, Socrates, and the rhetorical tradition*.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附錄一：回應反戰聲明之投書（依時間順序排列）

投書者編號	標題	網路媒體	日期
1. 丘琦欣 作家	「臺灣反戰聲明工作小組」複製西方左翼的 美國本位主義，卻不顧多極世界	New Bloom	無
2. 劉以正 政治工作	反戰不能只取悅入侵者 加強軍事傷亡更少	報呱	無
3. 黃厚銘 教授	反戰或反侵略？談「反戰聲明」的盲點	聯合新聞網	2023/03/20
4. 黎蝸藤 旅美學耆	臺灣「挺俄四醜」錯在哪裡？	上報	2023/03/21
5. 汪浩 評論員	致傅大為、盧倩儀、馮建三、郭力昕的公開 信	上報	2023/03/22
6. 林艾德 作家	偽中立者對臺灣的傷害	思想坦克	2023/03/22
7. 王顯中 記者	為何要反戰：至每一位大雄	苦勞網	2023/03/23
8. 孫瑋芒 作家	反戰聲明稱了普丁的心，合了中共的意	放言	2023/03/23
9. 盧郁佳 作家	「反戰聲明」：失控的中國認同	思想坦克	2023/03/23
10. 宋國誠 研究員	是「亡國論」不是「反戰論」——對四位教 授「反戰聲明」的批判	上報	2023/03/23
11. 李志銘 作家	人們為何看不見房間裡的大象？姑息侵略者 的「反戰論」	聯合新聞網	2023/03/23
12. 吳哲文 作家 陳立民 會計師	駁反戰聲明想像的「和平」 羞辱烏克蘭與臺灣人民	鯨魚觀點	2023/03/24

13.	張宇韶 研究員	臺灣左膠反戰學者把中共侵略威脅當兒戲， 一心只想回到造反解殖的 60 年代	關鍵評論	2023/03/24
14.	黃厚銘 教授	另一種意義下的反戰：強化國防不是挑釁 是企圖阻止戰爭發生	信傳媒	2023/03/25
15.	施芳瓏 研究員	以「臺灣反戰」之名，打「臺灣反反侵略」 的認知戰？	自由時報	2023/03/25
16.	馮建三 教授	不挑釁不仇中 兩岸就和平	聯合新聞網	2023/03/26
17.	彭振宣 評論員	臺灣左翼學者提《反戰聲明》與現實脫節， 又製造有利於中共軍事鎮壓的條件	關鍵評論	2023/03/27
18.	林修正 退休教授	另一角度看「我們的反戰聲明：和平、反軍 火、要自主、重氣候」	新頭殼	2023/03/27
19.	郭力昕 學者	反戰聲明與臺灣社會的「窒悶空間」	獨立評論@ 天下	2023/03/28
20.	鍾秀梅 教授	誰殺了笛卡兒？—關於「2023 反戰連署事件 簿」	風傳媒	2023/03/28
21.	傅大為 教授	敬覆汪浩的公開信	風傳媒	2023/03/29
22.	林修正 退休教授	評「傅大為專文：敬覆汪浩的公開信」	新頭殼	2023/04/01
23.	趙君朔 作家	馮建三教授的平行宇宙	思想坦克	2023/04/03
24.	傅大為 教授	一封反反戰朋友的好意來信——反戰 vs. 反 侵略的癥結問題	上報	2023/04/06
25.	陳沛安 大學生	反戰學者最荒謬處——中國軍隊開始殺臺灣 人了他們才要站出來保家衛民	上報	2023/04/08
26.	馮建三 教授	回覆趙君朔與「四醜」文針對「反戰聲明」 的質疑與挑戰	聯合新聞網	2023/04/11

27.	楊德涵 饒辰書 研究生	告 2024 總統候選人書：從反戰聲明，理出 臺灣路線的務實選擇	獨立評論@ 天下	2023/04/20
28.	洪倍源 退休主管	反戰聲明的思考：夾處大國間的臺灣，真的 可以靠「維持友好等距關係」求取和平？	獨立評論@ 天下	2023/04/21
29.	陳信仲 博士生	論投降主義的不道德性：虛妄的反戰自以為 義，還誤將「躺平」作「和平」	思想坦克	2023/04/24
30.	楊儒賓 教授	給〈反戰聲明〉下個注腳—別讓臺灣掉進 「主權國家」的黑洞	風傳媒	2023/04/2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A preliminary study of dialogue on online media responses of
Anti-War Statement

Pei-Wen Lee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Anti-War Statement" incident, addressing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What communication purposes and strategies are demonstrated through online writing submissions as a form of online communication following the statement's release? Do these submissions reflect the core arguments emphasized by Western dialogue theory? Through textual analysis, the study identifies four main types of communication goals and strategies used by contributors: (1) correction and belittling, (2) raising questions and engaging in dialogue, (3) reframing, and (4) self-defense. Notably, only a small number of contributions align with the central principles of Western dialogue theory.

Keywords: Anti-War Statement, speech freedom, dialogue theory, online dialogue, divergence communication